

# 论木围栏

曹大志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摘要:** 根据文献记载和民族志材料,各种形式的木质围栏曾在古代广泛应用。城邑、聚落、军营、宫殿、院落、王陵、墓地都可能用木栏围绕。由于保存的关系,这类设施在考古发掘中发现难度较大,但也已经积累了若干实例。本文据此推论一些青铜时代的考古遗迹和文字材料为木围栏,并建议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应采取针对性措施,注意木围栏遗迹的发掘。

**关键词:** 木围栏; 塹壕

**Abstract:** According to written and ethnological records, palisade and other wooden fences were widely used in antiquity. Cities, settlements, encampments, palaces, courtyards, mausoleums, and cemeteries can be enclosed by wooden fences. Due to poor preservation, this type of facility is hard to detect in excavations. Nevertheless, some examples have been attested. This paper suggests the presence of palisade in archaeological remains and inscriptions of the Bronze Age, and proposes to take corresponding actions to reveal wooden palisade in future field work.

**Keywords:** palisade; ditch

特  
别  
关  
注

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围栏。高大的围栏用于防卫,矮小的围栏具有警示、引导、保护的作用。围栏有悠久的历史,主要以各类木质材料建造。大约自龙山时代开始,随着人类建造能力的提高,防卫功能更强的土石墙体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但木围栏在青铜时代至历史时期仍长期、大量使用,并可以和墙垣、塹壕相配合。按照文献记载,木围栏的使用很普遍,考古发掘中却不太容易发现。然而,认识到木围栏的存在及其特点,对于研究聚落的布局很重要,对于理解一些历史问题也有帮助。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梳理文献材料——丰富的文献记载可以揭示木围栏的普遍性和具体的种类、用途;第二部分考察新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为以往认识比较薄弱的青铜时代提供参照;第三部分讨论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和出土文字材料,

辨析可能存在木围栏的遗迹、可能理解为木围栏的铭文,并建议今后在发掘墙垣、塹壕时,应对木围栏设施多予注意。

## 一、文献所见木围栏的种类、用途

文献中木围栏的种类繁多。以使用方式区分,有固定的,也有可移动的;以建造方法区分,有种植树木养成的,也有砍伐树干、枝条建造的;以形态区分,有密集排布的,斜向交叉编织的,也有栅格状纵横交错的;以功能区分,有牲畜、奴隶的牢笼,民间院落和聚落的藩篱,宫殿、王陵的禁卫,军队的营寨。我们梳理的重点是固定的、以树干枝条建造的围栏(只有此类能够留下考古遗存),兼及可移动的围栏。下面大体以文献年代为序,扼要地举一些例证,涉及的名目包括闲、阑、樊、藩、格、落、篱、裾、柴、栅、柵、柵、行马等十余种。

### (一) 闲

《说文·门部》：“闲，闾也，从门中有木。”闲的本义即木围栏，在《周礼》中指王行宫外的围栏、养马的围栏，也可以指买卖奴婢的围栏。

1.《周礼·夏官·虎贲氏》：“虎贲氏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军旅、会同亦如之。舍则守王闲。王在国，则守王宫。国有大故，则守王门。”郑玄注：“舍，王出所止宿处。闲，榭也。”贾公彦疏：“闲与榭皆警卫之物。”

2.《周礼·夏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邦国六闲，马四种；家四闲，马二种。”

3.《汉书·贾谊传》：“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颜师古注引服虔曰：“闲，卖奴婢闾。”

虎贲氏守卫的王闲，郑玄以功能相同的榭解解释，但贾公彦以为是两种警卫设施，更加准确。闲是固定的木围栏，榭是可移动的围栏（参后文）。《夏官·土方氏》“王巡守，则树王舍”，郑玄注“为之藩罗”，讲的是一个意思。因木围栏的含义，闲又引申有名词的界限、动词的阻碍、禁防等意思：

4.《尚书·毕命》：“虽收放心，闲之惟艰。”孔颖达疏：“闲谓防闲。”

5.《周易·家人》“闲有家”，陆德明释文引马融云“闲，防也”；《周易·大畜》“闲舆卫”，王弼注“闲，闾也”。

6.《国语·楚语下》“为之关籥藩篱而远备闲之”，韦昭注“闲，闾也；藩篱，壁落也”。

从《周易》《尚书》常抽象地使用闲的引申义来看，闲当木围栏讲的本义应是很早的。

### (二) 闾(栏)

闾与闲是同源字，声音、意义都相近。《广雅·释言》“闾，闲也”，古书中闾、闲相通的例子也很多。《说文·门部》说“闾”的本义是门遮，如《史记·楚世家》：“虽仪之所甚愿为门闾之厮者，亦无先大王。”闾字指一般的木栏是词义的引申，在先秦文献中已有指牲畜围栏的例子：

7.《墨子·非攻上》：“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

8.《墨子·天志下》：“踰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


这里栏、牢同义，《说文·牛部》牢，闲，养牛马圈也。汉以后“栏”是指称木围栏的常用字，例如宫殿四周的围栏：

9.《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司马贞索隐引《纂要》：“宫殿四面栏，纵者云槛，横者曰楯。”

10.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栏楯，殿上临边之饰也，亦所以防人坠堕也，今言钩阑是也。”

### (三) 樊、藩

《说文》：“樊，藩也。从爻，从林。”徐锴系传：

“二木中枝交也，会意。”樊字的金文字形写作，表示以木相交成藩篱。在文献中，樊可以指园圃的藩篱，也可以指养鸡的藩篱，应是用较小的枝条编织的：

11.《诗·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毛传：“樊，藩也。”

12.《诗·齐风·东方未明》：“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毛传：“樊，藩也。”

13.《庄子·养生主》：“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

樊在文献中有一个常用的通假字“藩”，《说文·艸部》“藩，屏也”；《玉篇·艸部》“藩，籬也”。藩可以指蓄养动物的围栏、房舍院落的围栏：

14.《易·大壮》：“羝羊触藩，羸其角。”陆德明《释文》引马融云：“藩，篱落也。”

15.《左传·哀公十二年》：“吴人藩卫侯之舍。”杜预注：“藩，篱。”

《左传》等文献常见“以藩为军”的说法，藩指军营外的围栏，用比较粗大的木头建造：

16.《左传·昭公十三年》：“及郊，陈蔡欲为名，故请为武军欲筑垒壁以示后人复仇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请藩而已。乃藩为军。”杜预注：“藩，篱也。”

17.《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庚辰，子木至自陈。陈孔奭、蔡公孙归生至。曹、许之大夫皆至。以藩为军，晋、楚各处其偏。”杜预注：“示不相忌。”

18.《国语·晋语八》：“是行也，以藩为军，攀攀即利而舍，候遮扞卫不行。”韦昭注：“藩，篱落也，不设垒壁。”

垒壁是军队在野外筑土而成的防御设施，《左传·文公十二年》“请深垒固军以待之”，孔颖达疏：“军营所处，筑土自卫，谓之为垒。”垒外有沟和各类木栏配合，《管子·制分》“故善用兵者，无沟垒而有耳目”；《六韬·军略》“设营垒则有天罗、武落、行马、蒺藜”。武落、行马都是木制围栏（参后文）。“以藩为军”是说建军营省去土工垒壁，只用木围栏。

木制的藩和土垣配合，在年代较早的《诗经·大雅》里已经可以看到：

19.《诗·大雅·板》：“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

藩是木栏，垣是矮墙，屏指夯土门屏，翰是筑墙端木。诗句用四个比喻，形容大邦像门屏，而大宗就像筑屏关键的端木；大师像垣墙，而甲士就像拱卫垣墙的木栏。

如果把军营视作防御严密的特殊聚落，那么藩相当于聚落外围的木栏。事实上，军营使用沟、垒、木围栏防御的作法，应来自于聚落防御的传统。

### (四) 格、落

格有长枝条的意思，《说文·木部》：“格，木长貌。”

徐锴系传：“树高长枝为格。”司马相如《上林赋》：“夭矫枝格。”由长枝条制作的木架、木墙等设施因而也称为格，如《集韵·铎韵》：“格，绳束墙板。”文献里“格”可以指狩猎动物用的木桩，也可以指在城外配合城墙的木栏：

20.《庄子·胠篋》：“削格罗落置罟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陆德明《释文》：“削格所以施罗网也。”

21.《墨子·备城门》：“塞外堑，去格七尺，为悬梁。城筵狭不可堑者，勿堑。”

堑是壕沟，堑与格相距七尺，说明木围栏和壕沟会配合使用。

“格”有一个通假字“落”<sup>①</sup>，在秦汉时期常指木围栏。《广雅·释宫》：“落，柅（按，篱的异体）也。”“落”在文献里既可以指院落的木围栏，又可以指聚落的木围栏：

22.贾思勰《齐民要术·序》：“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产不肥，鞭之可也；柅落不完，垣墙不牢，扫除不净，笞之可也。”

建造落可以用带刺的灌木，也可以用粗大的木料：

23.张衡《西京赋》：“措枳落，突棘藩。”李善注：“落，亦篱也。”

24.荀悦《汉纪·文帝纪下》：“要害之处，通山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国造篱落。”《汉书·晁错传》：“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颜师古注：“虎落者，以竹箴相连遮落之也。”

上引材料里的“枳落”是以带刺的枳编结的木篱，与棘编结的藩对言。“虎落”即《六韬》里的“武落”，颜师古解释为竹箴相连，但从考古发现来看也有用粗壮木桩制作的（详后文）。

落在不宜土墙的地方尤其适用，也可以和沟渠组合使用：

25.《管子·地员》：“黄唐，无宜也，唯宜黍稷也。宜县泽。行廌落，地润数毁，难以立邑置廌。”房玄龄注：“行廌及篱落。”

26.王褒《僮约》：“浚渠缚落，鉏园斫陌。”

《地员》篇说低湿的地方土墙易毁，故行篱落。《僮约》说僮要为地主庄园疏浚沟渠、绑缚篱落，渠、落并提，是因两者紧邻，都属于外围设施，有配合使用的关系。

落字由环绕居住地的围栏而引申指环绕起来的居住区域，这也是我们所用“聚落”一词的来源：

27.刘向《列女传·楚老莱妻》：“老莱子乃随其妻而居之，民从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

28.《后汉书·刘平传》：“所止聚落化其德。”李贤注引《广雅·释诂二》：“落，居也。”

29.《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各帅种

落。”吕延济注：“落，聚落也。”

### （五）篱（柅）

篱和柅是异体字。《说文·木部》：“柅，落也。”《集韵·支韵》：“篱，藩也，或作柅。”字书一般解释篱是用较小的木材制作的围栏。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四引服虔《通俗文》：“柴垣曰柅，木垣曰篱。”《释名·释宫室》：“篱，离也。以柴竹作之疏离。”慧琳《一切经音义》：“篱，小栅也，或以棘束或以树梢竖之为篱。”文献中篱可以指苑囿、院落、聚落的围栏，不见得很小：

30.《睡虎地秦简·徭律》：“县葆禁苑、公马牛苑，兴徒以斩（堑），垣离（篱）散及补缮之。”

31.《楚辞·招魂》：“兰薄户树，琼木篱些。”王逸注：“柴落谓篱……外以玉木为其篱落，守御坚重，又芬香也。”

32.《三国志·魏书·郑浑传》：“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

33.《宋史·单煦传》：“转知昌州，时诏城蜀治，煦以蜀地负山带江，一旦毁篱垣而兴版筑，其费巨万，非民力所堪，请但筑子城。”

例30中我们再次看到堑与木围栏组合使用。32、33两例的年代较晚，篱是种植树木养成的，围绕着聚落甚至城邑。“毁篱垣而兴版筑”说明聚落、城邑外存在先有木栏，后替代以版筑的情况。“但筑子城”说明郭城因规模大、成本高而常以木栏建造，很晚仍如此（如六朝时期的建康城）。

### （六）裾（楛）、渠

《释名·释宫室》：“离也，青徐曰裾。裾，居也，居于中也。”裾是篱的别名，文献记载用于城外，和城垣配合使用：

34.《墨子·备梯》：“置裾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之法，小大尽本断之，以十尺为断，杂而深埋之，坚筑，毋使可拔。”

35.《墨子·备城门》：“治裾诸，延堞，高六尺，部广四尺，皆为兵弩筒格。”

《墨子》所述“裾”为密布的树桩，比较高大。文中记录建造的位置、宽度、高度和方法，十分珍贵，可以与下文将谈到的考古发现相参照。裾在文献中又通作渠：

36.《周礼·夏官·掌固》：“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

王引之《经义述闻·周礼·树渠》指出渠、裾是通假字，并说：“渠谓篱落也，因树木以为篱落，古曰‘树渠’。《司险》职曰：‘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以林，以为阻固。’郑注曰：‘树之林，作藩落也，是其

证矣。”按《掌固》所说的树渠是配合城墙、沟池使用的围栏，而《司险》的“树之以林”应是以树木养成的，与之相似的还有：

37.《周礼·地官·大司徒》：“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郑玄注：“树，树木沟上，所以表助阻固也。”贾公彦疏：“于畿疆之上而作深沟，土在沟上谓之封，封上树木以为阻固，故云‘而封树之’。”

《大司徒》中的树指种植树木，封则是聚土为界，聚土的同时在旁边形成深沟。慧琳《一切经音义》“塹者，外穿像坑，坑内培土令高，犹如墙基，于上密种荆棘诸树，断人畜过，名之为塹”，将沟、土垄、树木组合使用解释得非常清楚，且“塹”的概念本身就包括了三者，尤其值得注意。

### (七) 柴、砦、寨

《说文·木部》：“柴，小木散材。”徐铉曰：“师行野次，竖散木为区落，名曰柴篱。”柴在文献里可以指建筑、聚落或军营的木栏：

38.《公羊传·哀公四年》：“亡国之社盖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

39.《庄子·天地》：“内支盈于柴栅，外重纆缴。”

40.《三国志·吴书·甘宁传》：“羽闻之，住不渡，而结柴营。”

柴的后起字又作寨、砦，《集韵·夬韵》：“柴，篱落也，或作寨、砦。”鹿柴、村寨等词皆是由围栏而引申出被围绕起来的区域之意。

### (八) 栅

《说文·木部》：“栅，编树木也。”《释名·释宫室》：“木垣曰栅。”慧琳《一切经音义》：“竖木为墙曰栅。”文献里栅常指军事用途的围栏，应比较大：

41.《三国志·魏书·徐晃传》：“使晃以步骑四千人渡津。作塹栅未成，贼梁兴夜将步骑五千余人攻晃，晃击走之。”

42.《后汉书·段颍传》：“颍规一举灭之，不欲复令散走，乃遣千人于西县结木为栅，广二十步，长四十里，遮之。”

例41显示塹与木栏配合使用；例42中的“广二十步、长四十里”，说明木栏的规模可以很大。栅因木栏的含义，也可以引申指围起来的居住区域：

43.《三国志·魏书·东夷·夫余》：“作城栅皆员，有似牢狱。”

44.《后汉书·东夷列传·夫余》：“以员栅为城，有宫室、仓库、牢狱。”

45.《后汉书·东夷列传·三韩》：“……故或名之为秦韩。有城栅屋室。”

### (九) 榑、行马

以上列举的都是固定的木围栏。可移动的围栏似

乎出现稍晚，由于搬运要花费很多人力，且需配备守卫，所以基本为社会上层使用。《说文·木部》：“榑，行马也。从木，互声。”徐锴系传：“汉魏三公门施行马。互者，交互其木也。”孙诒让《周礼正义》引惠士奇：“木如蒺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

46.《周礼·天官·掌舍》：“掌舍掌王之会同之舍，设榑榑再重。”郑玄注：“故书榑为榑。郑司农云：‘榑，榑榑也。榑，受居溜水潦囊者也。’杜子春读为榑榑，榑榑谓行马。玄谓行马再重者，以周卫有外内列。”

47.《周礼·秋官·修閭氏》：“修閭氏掌比国中宿互榑者。”郑玄注：“故书互为大，郑司农云：宿谓宿卫也，巨大为互，谓行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榑谓行夜击榑。”

掌舍所用的榑榑是王会同之舍的防护设施。《修閭氏》提到的互是官府门间的防护设施，且有宿卫人员。榑榑用木椽交互而成；郑玄所引故书“榑”“巨”通榑，是另一种解释。

榑榑在汉代以后称行马，俗称鹿角叉，是官府常用的仪仗防护，如《汉官仪》云：“光禄勋门外，特施行马以旌别之。”行马还能在宫庙、陵墓、营垒外围做半永久的使用：

48.《史记·五宗世家》：“四年，（临江王）坐侵庙墙垣。”《索隐》：“服虔云‘宫外之余地’。顾野王云‘墙外行马内田’。……墙垣，墙外之短垣也。”

49.《古今注》：“明帝显节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虞在行马内。”

墙垣是高墙之外的一重矮墙，按顾野王的说法，庙墙外的墙垣有用行马的，这和《周礼》中王舍用榑榑类同。至于陵墓用行马的，除了明帝显节陵，还有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质帝静陵，这应和先秦时期墓地外用木围栏的传统有关（参后文）。

总结上述各种名称的木围栏，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些共性。其一，这些名称一般可通用于多种功能，如动物的圈栏、院落的围栏、聚落或军营的围栏。其二，它们往往由木围栏引申指围绕起来的区域。其三，木围栏往往与低于地表的渠、塹，及高于地表的垒壁、垣墙紧邻着配合使用。木围栏有如此多的名目，可能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语言变化有关，但根本在于木围栏是非常普遍的事物。

## 二、木围栏的考古发现

木围栏在文献记载中非常普遍，但要在考古发掘时发现它却并不容易。就客观原因来说，栽种树木或用小枝条编成的围栏很难留下遗迹，只有用较粗大的枝干建造的围栏才能留下柱洞。柱洞能否被发现取决

于原始地面的保存状况,如果地面破坏不严重,或是围栏埋设在基槽里,柱洞可以保存较好;如果原始地面被破坏,柱洞很容易遗迹无存;围栏经常建于高起的土垄上,被破坏无存的机会也更大。与围栏有关的遗迹只有低于当时地表的埴壕容易保存下来。此外,聚落的围栏位于遗址边缘,边缘地带由于文化遗物稀少,多不被发掘者关注。

就主观原因来说,目前考古工作者对木围栏的存在还没有充分认识,很少有意识地去寻找。在针对聚落边缘地带工作时,一般只采用开设探沟的方式了解埴壕,探沟的宽度较窄,只能暴露大型遗迹的局部平面,不利于发现埴壕内侧可能存在的木围栏。几十年来的田野考古实践表明,聚落环壕的发现在考古工作者有意识开展针对性工作后数量激增,由此看来,将来只有主动地多加留意,木围栏才会有更多的发现。

2003年,许永杰先生曾根据日本弥生时代环壕聚落的启示,提出应注意城墙、城壕附设的木栅栏<sup>②</sup>。当时这类设施在我国还很少发现,而今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遗存里已经有不少木围栏的实例,下面我们按年代顺序列举各类木围栏的发现。

#### (一)姜寨、城烟

临潼姜寨一期聚落内发现有两座牲畜围栏。1号圈栏长5、宽3.9米,由0.13~0.27米宽的小沟槽围成不规则形,槽底发现柱洞22个,柱径0.08~0.4米。2号圈栏长3.64、宽3.05米,由0.04~0.1米宽的沟槽围成长圆形,残存9个柱洞,柱径0.06~0.12米。由于仰韶时期牛、羊尚未大量饲养,研究者一般认为这种较小的围

栏用于养猪。文献中的闲、阑、樊、篱等词可以指这种畜栏。

灵宝城烟遗址现存面积3万余平方米。遗址中北部的发掘中发现G7、G9两条仰韶早期的壕沟,壕沟之间发现两道平行的夯筑墙基Q1、Q2,墙内外分布有密集的柱洞,部分加工极好。发掘者推测应与G7、G9同为防御设施,提出“这种组合为同时期遗址中首次发现,应为最早的墙、壕并存的防御体系”<sup>③</sup>(图一)。墙内外的柱洞无疑就是辅助垣墙、埴壕的木围栏遗迹。

#### (二)丹土和城子崖

燕生东先生曾在论著中提到,大汶口晚期五莲丹土遗址城墙上的成排柱洞应为木栏遗迹<sup>④</sup>。孙波先生对丹土和后来城子崖的同类发现做了详细介绍<sup>⑤</sup>:

五莲丹土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墙在城顶近外沿位置,几处解剖探沟中都发现了条形基槽,其中有密集柱洞,当时以为是房基。但一来地层关系可证城墙当初只有约半米高,根本不足以起到满意的防御效果;二来这些基槽形制大小一致,位置相同,探沟内均未见拐角、分间现象,应该是单线条的,不是房址基槽。因此,则这些分处各段城墙顶部的基槽应该是连通的,由此可知当时环绕城顶存在这样一周基槽,也就是一周寨墙。

丹土的发现后来在城子崖龙山城墙的发掘中也得到了证实。后者在近年来的发掘中于龙山城顶中部发现长基槽,目前已发掘百米以上,顺墙而行。这条基槽应该也是寨墙遗迹。我们知道,山东龙山城墙除了景阳岗这种版筑起来的外普遍较为低矮,高度很难达到2米以



图一 灵宝城烟遗址的内外壕、垣、栏遗迹



图二 滕州西孟庄龙山文化聚落

上,往往需要深壕或者其他辅助防御设施,城墙顶上再起木制寨墙可能就是其中措施之一。

孙波先生根据实际发现指出早期的土垣低矮、需要木围栏辅助,这与文献记载的堑、垣、木栏配合相符,具有启发意义。

### (三) 西孟庄

滕州西孟庄是近年全面揭露的一处龙山文化早期带围栏聚落。聚落分早晚两期,围栏的形状和内部房子都发生变化,但围栏的建造方法基本相同(图二)。

早期聚落的围栏为方形,东西46~47米,南北约48米,发现三处缺口。围栏的做法是:先挖基槽(保存宽度0.5~0.8米,深度0.2~0.7米),基槽内密集栽一到两排木桩(木桩间距0.1~0.3米,直径0.1~0.16米),掩埋令木桩牢固(埋设浅的木桩直接立在基槽中,埋设深的在基槽底部再挖直径0.25~0.6米的柱坑)。基槽内沿一线再单独挖坑埋一排稍粗且间距更大的木桩,柱坑直径0.4~0.9米,间距0.4~1米,打破基槽内的填土。

晚期聚落为圆形,直径36米,发现缺口一处。围栏的做法与方形阶段相同,不同的是围栏外有宽浅的

围沟。围栏内侧0.5~1米还发现呈大半圈排列的35个柱坑,集中在东部、北部、西部,大部分与基槽内沿的柱坑一一对应。发掘者推测这些柱子可能用于支撑横木,使人能够登上墙顶<sup>⑥</sup>。

发掘简报把基槽内沿一线的柱子看作壁柱,从而认为基槽内竖立的是木骨泥墙。但根据现有迹象,内沿柱子的位置是部分在基槽内、部分在基槽外(从发掘照片来看,也有柱子完全在基槽外)。基槽不等于墙体,不能证明柱子是壁柱。对于内沿一线的柱坑,壁柱并不是唯一解释。只要是先埋设基槽内的柱子,再埋设内沿一线的柱子,就会形成现在的迹象。笔者认为,木骨泥墙的用处是防风雨、保暖,聚落的外围寨墙没有这个需求,且为了保护泥墙,还要专门做防雨的顶子,因此木骨泥墙实无必要。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民族志材料中也没有木骨泥寨墙的实例。更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基槽内竖立的是木栏,它们之间有横向的木杆连结,内侧面间隔设立の木柱则是为了加固木栏。

### (四) 藤花落

连云港藤花落遗址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内外两重城垣。外城平面呈圆角长方形,面积14万平方米,墙

宽21~25米,保存高度1.2米;城壕宽7.5~8米,深0.8米。内城平面为圆角方形,面积4万平方米,墙宽21~22米,保存高度1.2米。

在外城东、西、南城墙的发掘中,“长垄状墙芯”的中部和两侧发现有成排的柱洞。内城东墙的墙体夯土中则发现有密集的粗壮木桩。在发掘范围内,木桩顺着墙垣有7排,各排之间相距0.6~0.7米,每排之内柱间距为0.4米。木桩直径0.2~0.35米,残高0.6~1.2米(图三)。内城南墙靠近城壕的地方也发现有成排的木桩,柱径0.1米,间距0.2~0.3米。发掘者估计两重墙垣上原有木桩数以万计,但认为它们的功能是“加固”墙体、“防止墙体坍塌”<sup>⑦</sup>。研究者已指出这些木桩实为木栅<sup>⑧</sup>。它们树立在不很高的墙体上可以增强防御。对比文献,这种密集排布的多排木栏与《墨子·备梯篇》所说的“裾”最接近(见上引文献34),只是它的位置在城上而非城外。

#### (五) 郝家台

郾城郝家台遗址发现有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垣,平面呈长方形,占地2.8万平方米。城垣周长约680米,宽12米,保存高度1~1.65米。墙外有早晚两重城壕。

西城墙的发掘中,在不同层位的城墙夯土下发现有K7、K9、K10、K11、K12等“土柱状堆积”。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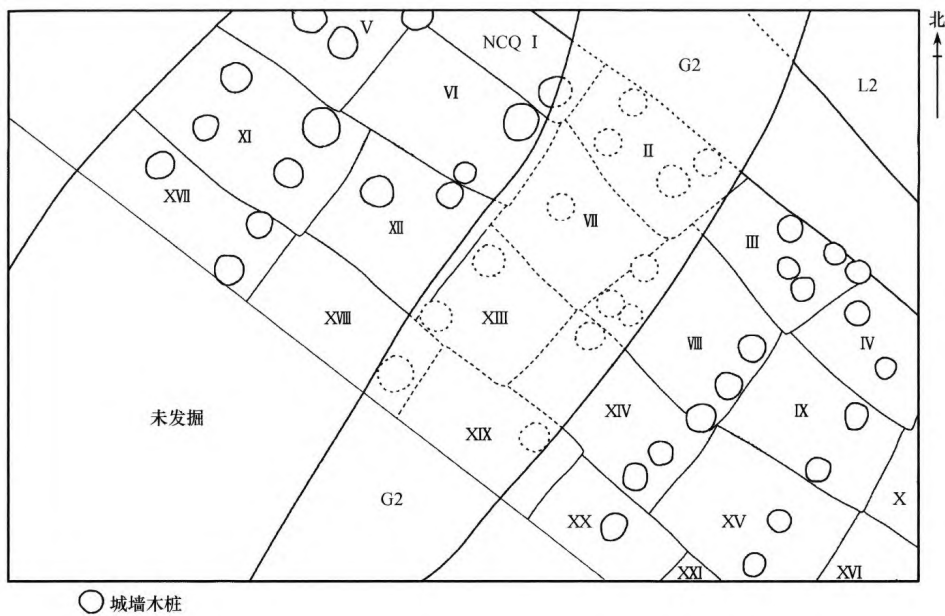
“土柱”的直径为0.29~0.5米,深0.52~0.85米(图四)。发掘者张海和李唯先生指出它们有可能是木栅栏的遗迹,可惜由于发掘面积较小,不清楚木栏的分布规律<sup>⑨</sup>。值得注意的是,解剖时城墙之下也发现有一些柱洞。由于分布规律不清,难以判断它们是栅栏还是早期房址。如果是前者的话,可能郝家台的城垣是在原有木栏的基础上增建的。

#### (六) 桐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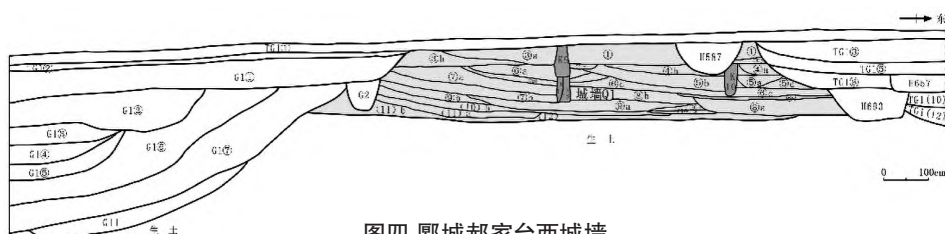
临淄桐林田旺龙山文化城址内的中南部发现有一处围墙遗迹。目前发掘区内只揭露了围墙的东南角,东墙长50米以上,南墙长60米以上。围墙的做法是先开挖宽0.4~0.8米、深约1米的基槽,然后在基槽内密集栽柱、填埋。柱洞直径约0.1~0.4米,柱间距0.1米左右,已见柱洞数百个。发现的多条基槽说明围墙曾被反复修建<sup>⑩</sup>。根据规模和结构,这些密集柱洞反映的应该是一座大型院落的木围栏,相当于上引文献25、26、31中的落、篱。

#### (七) 居延汉代遗址

居延地区发掘的几座汉代城障遗址都发现有防御性的木栏。甲渠候官遗址(破城子)的坞边长47.5×45.5米,夯土墙厚1.8~2米。坞外四周3米以内的地面埋设着四排尖木桩。木桩存高0.33米,间距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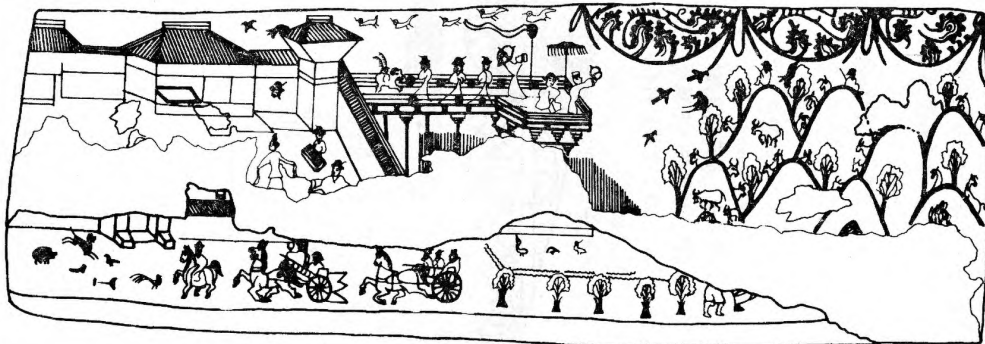
图三 连云港藤花落内城垣东城墙



图四 郾城郝家台西城墙



图五 肩水侯官遗址发现的木桩



图六 凤凰山一号汉墓壁画中的围栏

米。肩水金关遗址的关门内外、阙柱外侧、烽燧和堡屋外，发现与破城子相似的尖木桩，有的在下部刻一缺槽，再横贯一根短木。此外，甲渠塞第四燧、肩水侯官（地湾城）也见同类的木桩（图五）。发掘者认为这些尖木桩即文献和汉简中的“虎落”“僵落”<sup>⑩</sup>。如果向前追溯，《墨子·备城门》等篇中的格（格通落）、柵，指的也就是这种木栏。藤花落遗址墙上的木桩是其渊源，可见木围栏传统的强大。

#### （八）鄂托克旗凤凰山一号墓

内蒙古鄂托克旗的凤凰山一号汉墓，墓室西壁的壁画上绘有庭院和台榭，台榭外有用蓝色竖线表示的木栏，作为建筑和自然环境的边界<sup>⑪</sup>（图六）。根据壁画中人物的特殊装束、发式，画面景物可能是当地情况的反映。

上举考古发现里的木围栏有动物的畜栏、院落的围栏、城邑和聚落的围栏，与文献皆可对照。它们多因



图七 清代绘画中的瓔瑛和雅克萨

[引自清康熙《艾浑之地图》《罗刹之地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特殊的条件才得以保存(如较深的基槽里、破坏不严重的墙顶上、少有后人活动的地区),分布地域既有中原,又有干旱的西北、湿润的东南,时代从新石器时期持续到汉代。事实上,即使到了晚近的历史时期,使用木围栏的村寨、城镇仍很常见。例如清代的璦琿城和雅克萨都以木为垣(图七);东北地区也常见以木栏围绕的普通村落,当地称为“杖子”(意为棍子、板壁);云南佤族“村寨四周有防护沟,沟内壁上又有一道竹尖围成的防护圈,留前后左右四道大门,四道大门是用树枝、竹枝、刺搭成的通道”<sup>⑥</sup>。由于建造木围栏的速度快、投入比夯土墙和砖石墙低,按情理推测,在早期木材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木围栏的使用应很普遍。

### 三、青铜时代木围栏的探讨

前文第一部分引用的多数是先秦文献,第二部分列举的包括青铜时代之前、之后的考古发现,而青铜时代考古迄今没有木围栏的实例发现,这显然是不协调的。从几个方面来看,木围栏在青铜时代可能仍是普遍流行的。

其一,青铜时代考古工作总体上不如新石器考古那样关注聚落,过去报道的环壕聚落很少,但随着聚落考古观念的深入人心,近年发现逐渐增多,如驻马店杨庄、巩义花地嘴、伊川南洼、新郑望京楼大城、荥阳西史村、绛县西吴壁、阜南台家寺、桓台史家、唐山、前埠、济源柴庄、安阳陶家营、随州庙台子、高青陈庄等,大量的新发现说明带环壕的聚落可能像新石器时期一样普遍,而环壕经常与墙垣和木栏伴存。

其二,二里头、二里岗时期的几座城址现存城垣都较矮,如平顶山蒲城店的夯土厚1.5~1.75米(部分已是基槽),荥阳大师姑的夯土墙高1米,新郑望京楼的夯土墙高0.5~1.2米,夏县东下冯的夯土墙高1.2~1.8米,垣曲商城的夯土墙高1~1.75米。它们有可能被破坏得比较严重,但也有可能原本不是很高,类似常见的龙山晚期城址。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存在木围栏辅助土垣的可能。

其三,晚商、西周的出土文字材料把完整的聚落称为邑,如“土方征于我东鄙,翦二邑”(合集6057正),邑的字形写作,古文字学家认为邑是会意字,代表围垣,代表居民。这暗示着商周时期聚落有围垣是很普遍的。但是考古记录里我们却没有发现一般聚落普遍有夯土围垣。由此推测,一般聚落普遍有的可能是环壕和不易

保存下来的木围栏。

下面我们根据环壕和其他线索,提出一些可能有木围栏的遗迹案例,随后讨论商周时期出土文字材料中的木围栏,以期引起学界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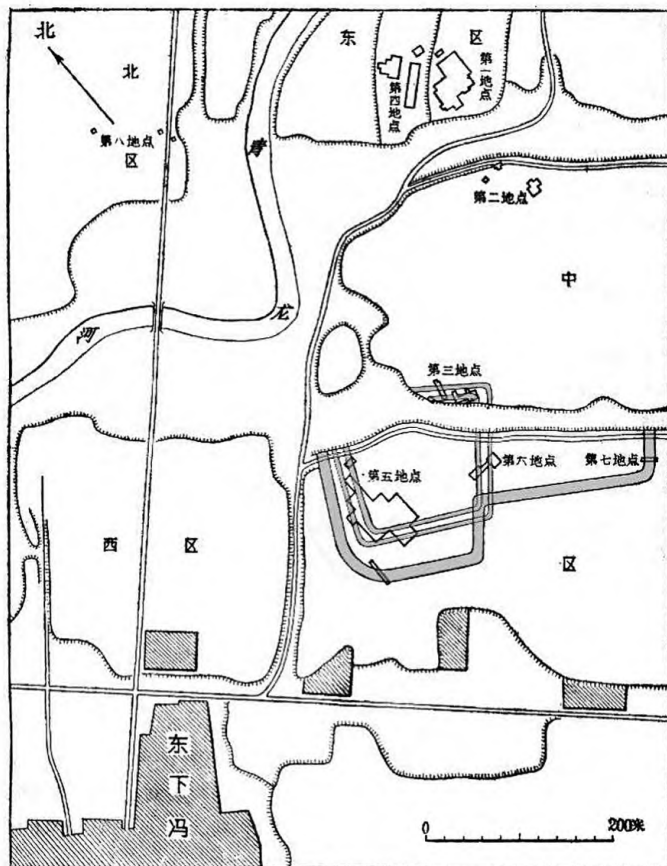
#### (一) 可能有木围栏的考古遗存

##### 1. 二里头宫城

二里头遗址的宫城呈长方形,面积约10万平方米,有2米厚的夯土围墙。围墙始建于二里头三期,墙外有同期的道路环绕。经解剖发现围墙下面叠压着二里头二期以前的宽阔道路。三期的围墙建于早期道路的内侧,与早期道路走向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在有夯土围墙之前,二里头宫城已经有道路环绕。刘绪先生据此指出,二里头三期之前,宫城应有木质的围墙<sup>⑦</sup>,发掘者许宏先生表示了赞同<sup>⑧</sup>。这个观察非常敏锐,试想如果没有某种围墙的限定,怎么会形成标准长方形的道路呢?二里头二期的宫城范围内已经出现多座大型建筑,这个大型建筑区属于统治阶层,显然需要与一般贵族和平民的生活区域相区隔,有木质围墙是很合理的。这样看来,二里头的宫城墙可能由木围栏而增建成夯土墙。

##### 2. 垣曲和东下冯商城

垣曲商城遗址的二里头时期聚落在南、西、北三



图八 东下冯遗址的双壕和城垣(灰色部分)

面有双重堑壕，与东面的自然河流围合，平面大致呈长方形，面积10万平方米。双壕不是很宽，如北面的G27宽4.7~13米，G26宽1.5~5.6米。进入二里岗时期，西、南两面的双壕经清理、修整用作基槽，其内夯筑起两道墙体。北面的双壕填埋做路沟使用。聚落向北扩展160~170米，增建了夯土的北城垣和东城垣<sup>⑥</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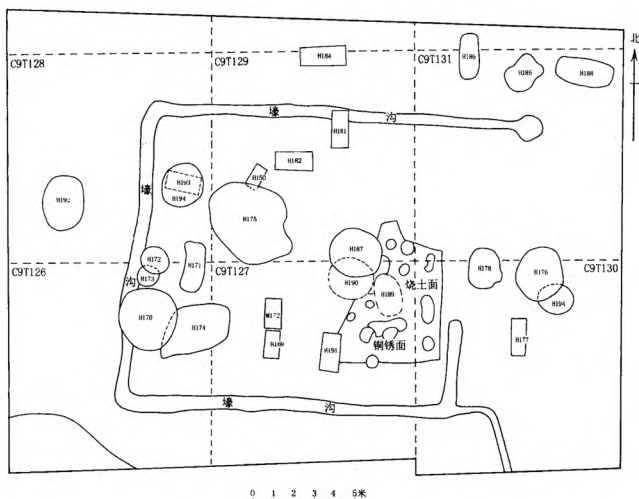
东下冯商城的发展过程与垣曲商城相似，二里头时期已经存在环壕聚落，内、外双重堑壕分别宽4.9~5.6、2.9~3.9米（口部），深2~2.9、2~3米。进入二里岗下层时期，聚落外围设施进行了改扩建。西、南壕的外侧，与原堑壕平行兴建了夯土城垣；聚落向东扩展最多，但新的南墙有一个向北的拐角，恰在原堑壕东南角的位置。这些位置关系说明夯土城垣兴建时，原聚落外围仍有可见的设施，否则夯土城墙与原来的堑壕不可能完全平行（图八）。

垣曲商城和东下冯商城都是中原早期国家向山西南部扩张而打造的控制体系的一部分，聚落在建立之初就有规划。这样的聚落通常重视防御，需要立体的、可视的设施，仅仅在地上不可见的堑壕是薄弱的。值得注意的是，两遗址在二里头时期都有平行的双壕，两壕间距很近<sup>⑦</sup>，可知成因不是聚落扩展；双壕完全平行，也不会是先后形成（壕沟淤塞淤积会有打破关系，不会形成另一条完全平行的壕沟）。通常认为双壕是为了加强防御，那么两壕之间就很可能有高出地表的墙垣、木栏，犹如灵宝城烟的发现，以及后世有内外壕的城址。垣曲和东下冯商城由其他限定边界的设施而增建夯土墙，这个过程与二里头宫城墙的发展过程很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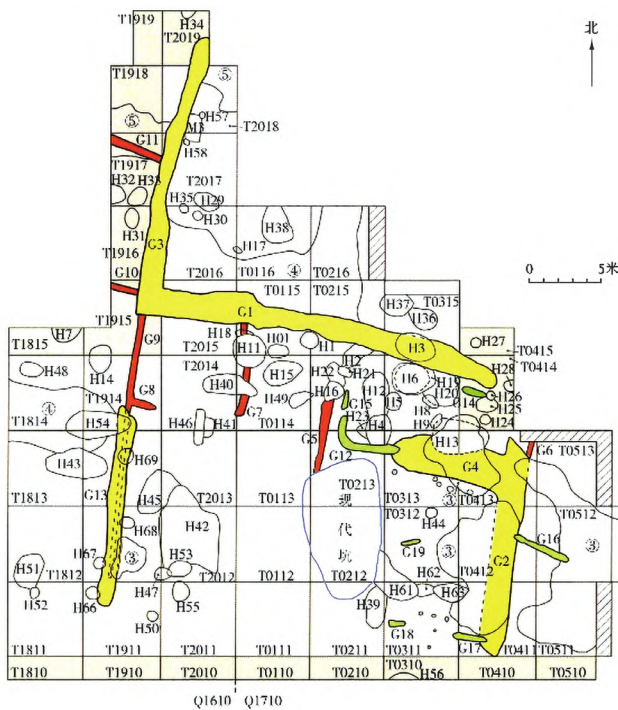
### 3. 郑州商城、盘龙城的铸铜工场

郑州商城南关外铸铜工场北区发现有四面窄沟，大致围成长方形，东西19米，南北14.5米。窄沟内为铸铜场地，东面留有出口。沟宽0.5~0.9米，深1~1.5米（图九）<sup>⑧</sup>。这样窄的沟显然没有什么防御功能，应该如临淄桐林遗址的院落一样，是埋设木栏的基槽；或者是围沟内侧堆成土垄，上面再埋设木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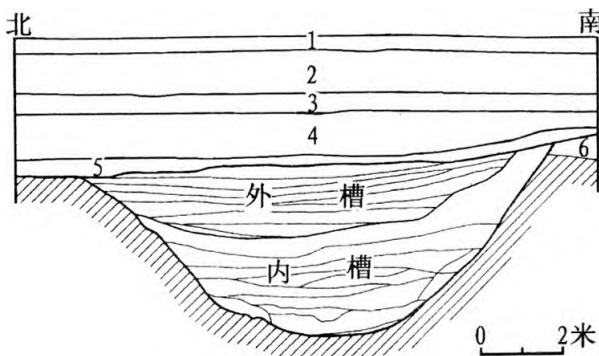
近年盘龙城小嘴发掘的铸铜地点也发现多条窄沟，G1、G3和G2、G4、G13大致围成两个长方形单元，东西约26米、南北分别为13、19米，长方形内的活动面已破坏无存。窄沟宽约1.4米，深0.18~0.4米，里面填埋有生活垃圾和铸铜相关的废弃物品（图一〇）<sup>⑨</sup>。这几条窄沟可能与郑州商城的性质相似，沟内侧原本堆土，上设木围栏。两处遗址都



图九 郑州南关外铸铜工场



图一〇 盘龙城小嘴铸铜工场



图一一 洹北商城北壕沟剖面

属于手工业工场,可能有一些特别的保护。

#### 4. 洹北商城

洹北商城大城平面近正方形,面积470万平方米。试掘简报称城墙只有基槽部分,未及夯筑地上墙体<sup>⑥</sup>。然而对夯土基槽的性质,郑振香先生曾表示疑问,岳洪彬、何毓灵、岳占伟先生指出所谓城墙基槽只是壕沟,许宏先生也做了细致的论证<sup>⑦</sup>。

笔者认为诸位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大城所谓夯土基槽的剖面形状不规则,深度过深(达4米);“内、外槽”的结构是典型的壕沟淤积;“夯层”散乱,有的厚度达50厘米,不符合这个时期夯土的特征(图一一)。凡此都说明遗迹并非夯土基槽。简报称“基槽”以外无城壕,因为“基槽”本身其实是城壕。

洹北商城的方形城壕十分规整,这是因为它是一次规划、平地起建的都城。早期王朝的都城常以宏伟壮观令普通人心理震撼,大型建筑和城墙都能起到这个作用。城壕曾经淤积,说明使用了一段时间。然而外围设施如果只有城壕,那么在这段时间内,规模庞大而严整的大城在地平线上是不可见的(可见的是普通民居簇拥着长795、宽515米的宫城)。试掘简报发表的剖面图范围只比城壕略宽,但北城壕内侧的地势明显缓缓高起。笔者推测城壕内侧可能原有土垄和木围栏,只是不易保存、发现。作为中心都城的二里头可能使用木围栏,为洹北商城提供了一个

参照。王城岗大城、望京楼大城、官庄大城也都只有堑壕环绕。或许有学者会认为洹北大城周长8000多米,木围栏的规模太大。但从第42条文献中长达40里的围栏可以看出,建造大规模的木栏对古人不是问题。在对第33条文献的讨论中,我们曾提到郭城用木栏恰是为了节省成本,历史时期的建康和泉州郭城仍是用树木环绕。堑壕、矮垣、树木相辅可能是古代郭城的一种形态。

#### 5. 殷墟宫殿区、王陵区

殷墟发掘近百年来还没有发现夯土围墙。作为一个大都市,有没有城墙都很正常,但商王居住的宫殿区却不会和民众没有隔离。过去认为在小屯宫殿区的西、南方有一条大沟,可以作为宫殿区的边界。但后来的工作认为宫殿区形成时,大沟已经填平。新近的工作表明宫殿区范围可能比以往认为的要大,这就是说,宫殿区的边界还没有找到。

从文字材料来看,甲骨文提到商邑的许多门,如“乙门”“丁门”“三门”。有些显赫的门似乎独立于建筑,例如商王常“寻”于“南门”,也曾“寻”于祖丁且、大学、王宅,南门的地位并不附属于某座单体建筑。裘锡圭先生曾提出南门是大庭南面的正门,并类比了二里头一号宫殿的南门,很有道理<sup>⑧</sup>。这种门相当于王宫的大门。门是相互分隔之空间的出入口,孤立的门不能实现功能,它应该连接着某种形式的围墙,因此根据文字材料可以推测商王的宫殿区是有围墙的。将来很可能



图一二 荥阳关帝庙遗址

会发现夯土围墙,也有可能为木垣。

不仅生前的居所会和民众隔离,商王死后安葬的地方也应与外界有所区隔。殷墟王陵区最近的工作显示两组大墓的外围分别有长方形环壕围绕。已探明的东环壕东西长246米,南北宽236米,口部最宽处超过10米,深3.5米<sup>⑧</sup>。商王陵区应为守卫森严之地,低于地表的壕沟不能起到警示作用。从东周时期的文字材料来看,墓地边缘有可能存在木围栏(详后文)。

#### 6. 荥阳关帝庙

关帝庙是一个难得被完整揭露的晚商基层聚落。聚落面积约2万平方米,外围有一周圆角方形的堑壕环绕。堑壕口宽0.2~1米,底宽0.1米,保存最深1.3米,在聚落南部有一段8米的中断,尚保存着当时的路土,是聚落的出入口。由此可知堑壕上部被破坏得不多(遗址上曾有近代平整地活动)。发掘者指出,如此窄而浅的堑壕不具备防御功能,应是区分区域的界沟。笔者推测堑壕的内侧可能原有土垄和木围栏,甚至堑壕也可能是埋设木围栏的基槽(图一二)。

在上述多个案例里,我们推断木围栏的主要依据都是堑壕,因为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表明围栏常与堑壕、墙垣并存。考古发现往往只见堑壕,但堑壕通常不是孤立、唯一的外围设施,这是由于以下现实原因:第一,几种设施配合可以加强防御功能。人工挖掘的堑壕深度一般为数米,在堑壕内侧筑垣、立栏造成了多重障碍,又可以增加高差,制造通过的困难,从而增强防御功能。第二,除了物理性的防御,外围设施的重要功能还在于标识、警告,这需要设施具有可视性,而堑壕低于地表,只有到了近前才能看到,墙垣、木栏更能实现这项功能。第三,开挖堑壕必然出土(使用阶段的淤积也要出土),或者堆于堑壕内外,或者运走另作他用。从工程的目的来说,挖堑壕是为了防御,既然如此,堆土筑垣更能加强防御功能,一般情况下就没有理由运走<sup>⑨</sup>。或许有研究者会提出用土建房的可能,但和平时期的聚落一般是先定居下来,再建设公共防御设施,这和战争时期的军营先建设壁垒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开挖堑壕时理应有住屋。即便是用土盖房,堑壕所出的土方量也远比建房需要的多<sup>⑩</sup>,仍有大量可用于墙垣。堑壕、墙垣的组合是工程的自然结果,对古人来说实为一举两得。《周礼·大司徒》贾疏所说“作深沟,土在沟上谓之封,封上树木以为阻固”,《一切经音义》所说“外穿像坑,坑内培土令高,犹如墙基,于上密种荆棘诸树”,都揭示了这个道理。可以说,带堑壕的聚落原本大多是有墙垣的(现状不见,是因为后期的破坏,特别是农耕地频繁的人类活动破坏),墙垣若不是高大的版筑夯土就需要木栏辅助,堑壕、墙垣、木栏因此环环相扣,形成

组合。

#### (二) 出土文字里的木围栏

以上的分析涉及院落、聚落、城邑。出土文字里也有可能指木围栏的材料,可以印证木围栏存在于商周时期。这里仅就管见所及讨论两个例子。

1. 商末周初的铜器铭文里,屡见一个称为“阌”的地方或处所:

戍掣鼎(集成2708)

丙午,王赏戍掣贝廿朋,在鬲宰,用作父癸宝簋。唯王饗鬲大室,在九月。犬魚。

大万尊<sup>⑪</sup>

辛未,婦尊宜在鬲大室。王饗酒,奏庸,新宜吹。在六月。鮪十終三朕。通王賞,用作父乙彝。大万。

亚古簋(集成3861)

己亥,王賜貝在鬲,用作父己尊彝。亞古

宰梳角(集成9105)

庚申,王在鬲,王各,宰梳从,賜貝五朋,用作父丁尊彝。在六月,唯王廿祀,翌又五。

版方鼎(新收1566)

乙未,王賓文武帝乙彤日自鬲侑,王誕返,入鬲,王賞版貝,用作父丁寶尊彝,在五月,唯王廿祀又二。

利簋(集成4131)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鬲,賜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寶尊彝。

新邑鼎(集成2682)

癸卯,王來奠新邑,二旬又四日丁卯,□自新邑于東,王□貝十朋。用作寶彝。

鬲監鼎(集成2367)

鬲監□作父己寶肆彝

作地名或处所的这个字由门、宀、束、月四个部分构成,最简单的写法只有门、束二部分,最复杂的写法四部分都具备,甚至可以像戍掣鼎的累加一个“月”。四部分中“门”“宀”是意符,“束”“月”是声符(束,见母元部;月,疑母月部)。以往一般分析为从閫、束声,隶定为阌。

目前学界对“阌”的理解可以分为两类。主流意见认为阌是一个地名,具体所在又有不同看法。于省吾先生认为阌应读管,在今河南郑州<sup>⑫</sup>。这是长期以来影响最大的观点;但多年的考古工作表明殷墟时期的郑州地区比较衰落,缺乏高等级遗址,难以与商王经常活动的阌对应。马承源先生认为阌应读淇水之淇,即朝歌故地<sup>⑬</sup>。李学勤先生指出“阌”从义符“宀”,是由于它本指建筑物的阌干,但他依据利簋铭文中“在阌自”的辞例认为阌确是地名而非建筑物之类。李先生又根据版方鼎铭文认为阌距帝乙的宗庙不远、根据《逸周书·世俘》的内容提出阌就在商都附近<sup>⑭</sup>。近年

来更多的学者开始认为阒应距商都城很近。

另一类观点认为阒是一个与宫室建筑有关的词。田宜超先生认为阒是商代的宫室名,根据文献记载的商末史事提出“阒在商邑朝歌城中,无事外求”<sup>⑧</sup>。唐际根、汤毓赞先生进一步提出阒指“商代都邑内的大型四合院”,具体为洹北商城一号建筑基址和殷墟小屯丁组基址<sup>⑨</sup>。

从字形来看,阒很可能与建筑有关,甲骨文文中加“宀”的字大都有建筑或设施的意思。但像唐际根先生这样把阒字直接理解为宫殿宗庙建筑会有几个问题。其一,“阒”有这个义项在文献中不见线索;其二,根据“阒大室”认为阒是建筑物,但金文中没有在大室前再冠具体建筑物的用例;其三,洹北商城一号基址北面11室大小很接近,每间都独立开门,看不出哪间是大室,若以一排11间房屋为大室则令人费解。

由出现阒的几篇铭文可以看出,阒在商末周初非常重要:商王常在阒赏赐臣下,阒内有“大室”、侧室(个)<sup>⑩</sup>,王和妇在阒大室祭祀、宴饮,阒外还有“冉”<sup>⑪</sup>。周武王克商后的几日内曾在阒停驻。西周中期前后阒仍设置有监。体会文意,阒应比宫室的范围大,很像是一个地名。这样看来,两种意见都有其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两种意见都有先生提到了朝歌,这是因为朝歌在文献记载中是商末有王都性质的地方。《古本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鄲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帝王世纪》:“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阒目前不见于较早的甲骨文,而只见于帝乙、帝辛时期的铜器铭文,这与朝歌作王都的年代也相符。根据《竹书纪年》推测,朝歌可能本有离宫性质,这令我们想到传世文献里记载的“王闲”。

阒、闲是同源字。鄂侯驭方鼎“休阒”读“休闲”;王子午鼎“阒阒兽兽”读“闲闲攸攸”,这是金文中阒读闲的例子。《说文·门部》“闲,阒也”,《广雅·释言》“阒,闲也”,古书中阒、闲相通的例子也很多。

《周礼》中的王闲是王在军旅、会同时的行宫,这与朝歌的地位相符。朝歌作为商末新的政治中心使用时间不长。同一时期,殷墟仍旧是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或许朝歌城当时称为“闲”,是因为那里只有木围栏(朝歌则是见于《左传》《竹书纪年》的战国地名)。这个称呼本有实际含义,指用木围栏围起的范围,久之变得与地名相当,类似“新邑”“京”等词汇演变为具体地名的情况(很多地名是由人工或自然地物长期指代而来的)。

商亡之后,西周早期的新邑鼎提到“口自新邑于

束”,说明此时“阒”仍有重要地位。大约西周中期有阒监鼎,监一般设于诸侯,显示此时周人对商末旧都仍比较重视。但总体来说,阒只零星出现在西周铜器铭文中,这是因为周王不再于此频繁活动,“阒”这个名称逐渐湮没无闻。地名往往有阶段性,一个可以类比的事例是,五代时期留从效在泉州扩建新城,环城遍植刺桐树,泉州因此也叫刺桐城。这个名称在宋元时期很流行,但后来也就成了历史性的名称。理论上,商周时期还会有其他的王闲,但现有的出土文字里未见堪与商末“阒”相比的王闲。

2.曾姬无卣壶铭文有“吾宅兹漾陵蒿閒之无匹”语,刘信芳先生据《说文》“蒿,死人里也”、《汉书》颜师古注“蒿里,死人里”的记载,指出蒿閒的意思是墓地。这个意见得到了学界比较广泛的认可<sup>⑫</sup>。刘先生并指出包山简103、115中的“鄙邠”是楚王的陵区<sup>⑬</sup>。楚官玺中有“鄙閒口玺”“虚閒中玺”(玺汇5559),应该属于管理墓地的官员。

楚官玺又有“外閒”(玺汇3215)、“野閒畏大夫”(玺汇0183),肖晓晖先生指出“蒿里”之所以表示墓区,关键在于“蒿”字;“外閒”“野閒”无“蒿”字,与墓区无关<sup>⑭</sup>。《说文》“野,南阳西鄂亭”;慧琳《一切经音义》引《公羊传》何休注“野,鄙也”;玄应《一切经音义》引《仓颉篇》“国之下邑曰野”。无论按那种理解,“野閒”涉及的都是生人聚落而非死人墓地。

为何死人墓地和生人聚落的名称都有“閒”字,“蒿閒”“虚閒”“野閒”“外閒”中“閒”字是什么含义?何琳仪先生认为“閒”是一个地名后缀<sup>⑮</sup>,李家浩先生认为“閒”应读作闲。《说文·门部》“闲,门也”,引申为里闲。笔者以为閒、闲相通更常见于文献,楚王陵的“鄙閒”与文献“王闲”相似,所以閒当读为闲。各种閒并非无意义的地名后缀,野閒、外閒的“閒”本指木围栏,进而引申为木栏包围的聚落。野作为鄙或下邑,仅用木围栏很合适。蒿閒、虚閒中的“闲”也指木围栏,进而引申指木围栏保护起来的区域,亦即墓地。墓地用木栏围护的例子,前文提到有“无周垣,为行马”的东汉帝陵。考古遗存里,秦、晋、齐、楚等国墓葬流行“围墓沟”为人熟知,新的发现表明围墓沟至少应追溯到商代。这些围沟暗示着配套的土垄和木栏。当然,墓地的木围栏是仿照自生人聚落的同类设施。

#### 四、余论

本文借助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试图说明木围栏是一种古代相当普遍的设施,进而对青铜时代可能的木围栏遗存和文字材料进行了解读。作为人为设置的各

种边界,木围栏对研究聚落形态很重要,因此尽管发现的难度较大,仍非常值得在田野工作中仔细寻找。目前对堦壕的发掘方法一般是开设探沟,了解堦壕的剖面形制和形成过程、年代。建议在今后发掘堦壕时,应对堦壕内外做较大面积的平面揭露,以了解是否残存有土垄,注意是否有木围栏的遗迹。

由于保存的关系,田野考古遇到最多的是低于当时地表的遗迹,于是常见一种认识误区,把发掘中最多见的遗迹形式当作古人使用最主要的形式。例如,商周时期发现的小型房子最常见半地穴式,多有论著认为当时的普通人居住其中。但半地穴房子发现的绝对数量是很少的,这说明大多数小房子应是地面式的,只是更容易被破坏掉。就聚落防御设施来说,以往研究虽认识到堦壕应伴存土垄、栅栏,且是城垣的雏形,但仍认为环壕聚落防御设施的重心是壕沟。然而,本文引用的文献提示我们,古人从来没有把地上设施的重要性置于堦壕之下。我们不应忘记,考古遗存是残迹,当时地表以上的遗迹绝大多数已被破坏。有的设施留不下痕迹,有的设施只留下很少的痕迹,木围栏正是后者的实例。考古学研究有时要求我们从很少的残迹中去想象古代社会的原貌。

## 后记

多年以来,我习惯了遇到困惑去找刘老师请教,有了发现去找刘老师汇报,写了稿子去找刘老师把关……这是最后一篇和刘老师商量过的文章,他鼓励我把文献梳理好,还提示了具体的考古材料,然而完稿时刘老师已看不到了。

刘老师去世后大概半年多的时间里,我都觉得刘老师并没有走。他就坐在那里,也许是工地的整理间,也许是学校的办公室,再忙也会放下手里的事情,让你觉得随时可以去打扰。请教学术想法,聊聊八卦掌故,吐槽一下社会黑暗……当这些都无处诉说,我终于意识到刘老师真的走了。

回想起来,刘老师在我上学、工作、结婚、留学、再工作的所有重要时刻都是我的贵人,而我却迟钝地在他走后才意识到这些。我所做的,似乎一直是有事没事地去给这位大学者添麻烦。我也知道,像我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很多。刘老师的好,润物无声。

作为一个通过物质遗存研究历史的人,有时我会想,我们这些人对刘老师的感情真的有意义么?它终将归于无形,什么也留不下来。可是,我也坚定地相信,驱动人类行动的正是这种感情。或许将刘老师的真、善、美传递下去,千年之下、在历史中,让它影响着其他人,我们这些人的感情终会是有意义的。

## 注释:

① 两字都从“各”得声。《史记·酷吏列传》:“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淮南子·时则训》:“夏行春令,风;行秋令,芜;行冬令,格。”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引王引之曰:“格,读为落,谓夏行冬令,则草本零落也。格字从木各声,古读如各(说见《唐韵正》)。格与落声相近,字相通。”

② 许永杰:《考察日本弥生时代环壕聚落的两点启示》,《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17日。

③ 灵宝城烟遗址和北阳平遗址考古发掘,见[https://www.sohu.com/a/517429436\\_121124392](https://www.sohu.com/a/517429436_121124392)。

④ 燕生东、高明奎、苏贤贞:《丹土与两城镇玉器研究——兼论海岱地区史前玉器的几个问题》,《东方考古》第3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⑤ 孙波、梅圆圆:《基层聚落还是军事据点——山东滕州西孟庄龙山寨墙聚落的一些探讨》,《中国文物报》2020年5月23日。

⑥ a.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山东滕州市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考古》2020年第7期; b.《基层聚落还是军事据点——山东滕州西孟庄龙山寨墙聚落的一些探讨》,《中国文物报》2020年5月23日。

⑦ 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博物馆:《藤花落——连云港市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5年。

⑧ 燕生东、高明奎、苏贤贞:《丹土与两城镇玉器研究——兼论海岱地区史前玉器的几个问题》,《东方考古》第3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⑨ 发掘简报提出它们的用途或与施工过程中支撑墙体有关,见梁法伟、张海、李唯等:《河南漯河郝家台遗址2015-2016年田野考古主要收获》,《华夏考古》2017年第3期。张海、李唯先生在与笔者的交流中提出这些“土柱”也可能就是在低矮城墙上设置栅栏的柱洞。

⑩ 桐林考古队田野发掘资料,感谢赵辉先生概允使用。

⑪ 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

⑫ 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70页,图十四下。

⑬ 西盟佤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西盟佤族自治县概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

⑭ 刘绪:《若干田野考古现象分析》,《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

⑮ 许宏:《先秦城邑考古》,金城出版社,2017年。

⑯ 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垣曲商城(二)》,科学出版社,2015年。董琦先生在《垣曲商城遗址始建年代研究》(《中原文物》1997年2期)中指出二里岗期墙下的基槽为二里头时期的壕沟。虽然《垣曲商城(二)》报告予以反驳,但西、南两面基槽显然过深(南墙基槽深2.4~2.7米,西墙基槽深5.8~6.55米)。作为对比,二里岗时期兴建的北、东两面城墙的基槽深度分别只有1.2、0.8米。因此,董琦先生的认识是有道理的,垣曲商城的西、南墙基槽曾为早期的壕沟。

⑰ 东下冯的内外壕沟相距5.5~12.5米；垣曲商场的内外北壕相距1~2米，内外南壕相距4~14米，内外西壕相距7~10米。

⑱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上册，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27~329页。

⑲ a.邹秋实：《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小嘴2015-2017年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6期；b.路晋东、张昌平、许鑫涛：《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小嘴2017-2019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0年第6期。

⑳ 唐际根、荆志淳、刘忠伏等：《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察与试掘》，《考古》2003年第5期。

㉑ a.郑振香：《安阳殷墟布局及其相关问题》，《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b.岳洪彬、何毓灵、岳占伟《殷墟都邑布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c.许宏《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㉒ 裘锡圭：《释殷墟卜辞中与建筑有关的两个词——“门塾”与“自”》，《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㉓ 牛世山：《殷墟商王陵区新发现2个围沟、400余座祭祀坑》，“文博中国”公众号，2022年1月18日。

㉔ 例如，半坡遗址的北部围沟外侧发现有带状的灰褐色硬土，现存长约20米，宽5米，厚0.1~0.8米。参看钱耀鹏：《半坡聚落与黄河流域夯筑城址的发生》，《文博》2000年第2期。

㉕ 以洹北商城为例：根据考古简报提供的数据，洹北环壕的出土量约为22.6万立方米，宫城墙（按高4米估算）的建设需土5万立方米；一号宫殿的台基（按高1米估算）、墙体（按高3米估算）、房顶（按厚0.2米估算），共需土7000立方米；二号宫殿的台基（按高1米估算）、墙体（按高3米估算）、房顶（按厚0.2米估算），共需土3000立方米。也就是说，环壕的出土量建造数十个一号、二号这样的大型宫殿仍绰绰有余。当然，环壕内的建筑不可能都从环壕取土来建造。参看a.《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察与试掘》，《考古》2003年第5期；b.中加洹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课题组、唐际根、荆志淳等：《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遗址2005-2007年勘察简报》，《考古》2010年第1期；c.《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1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5期；d.《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二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1期。

㉖ 朱凤瀚：《新见商金文考释（二篇）》，《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2015年。

㉗ 于省吾：《利簋铭文考释》，《文物》1977年第8期。

㉘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

㉙ 李学勤：《试论新发现的版方鼎和荣仲方鼎》，《文物》2005年第9期。

㉚ 田宜超：《虚白斋金文考释》，《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辑。

㉛ 唐际根、汤毓赞：《由金文“鬻”论及商代都邑布

局》，《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7年。

㉜ 成鬲鼎铭中的𠄎以往多释为“宗”，但学者已指出𠄎下的𠄎与“示”相差很多，释宗只是权宜之计。姚萱考释卜辞中的“帝五𠄎臣”、“多王臣”之𠄎、𠄎即“个”字（上下出头与否则不构成文字的区别性特征）。根据这个意见，𠄎可能是“个”字，从𠄎从个之字当是文献中意为“厢屋”的“个”。《礼记·月令》“天子居青阳左个”、“天子居青阳右个”。《左传·昭公四年》“使置馈于个而退”，杜预注“个，东西厢”。参看姚萱：《从古文字资料看量词‘个’的来源》，《中国文字》新三十七期，艺文印书馆，2011年。

㉝ 笔者认为“冉”当释为廬，参看曹大志、张剑葳：《商周时期的廬》，《考古学研究》十三，科学出版社，2022年。

㉞ 刘信芳：《蒿宫、蒿闲与蒿里》，《中国文字》新二十四期，艺文印书馆，1998年，第113~120页。

㉟ 包山简103：“子司马以王命命龔陵公龔、宜阳司马强贷邲異之黄金，以贷邲邲以糴种。”包山简115：“令尹子士、大师子緇命龔陵公邲龔为邲邲贷邲異之錫金一百益二益四两。”

㊱ 肖晓晖：《楚官玺释读二则》，《励耘学刊》（语言卷）2005年第2期。

㊲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1998年，第914页。

（责任编辑：王雁君）